• 行政学研究 •

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1998—2016

陈振明,张 敏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我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政策工具研究已走过近 20 年的历程,正在成长为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一个有前景和生命力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颇丰。以 CSSCI 收录的论文及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教材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文本内容分析方法,对国内政策工具研究的进展进行文献评述发现,当前国内该领域研究在工具分类、选择、评价和创新等方面既有基础性的概念界定,也有深层次的理论建构,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西方的模仿以及其话语体系的套用。为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应以政策问题的解决为导向,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构建本土化特色的研究途径。

关键词:政策工具;政策科学;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7)06-0109-08

政策工具(又称政府工具或治理工具)研究是当代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效率的工具研究在西方得到了迅猛发展。[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快速成长为西方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焦点,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2] 我国学界对政策工具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末。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亟待创新,这对政策工具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公共领域的具体政策实践进行了大量经验性的、实证性的研究,可以说,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研究政策科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3]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已有期刊文献、专著和教材进行分析,简要评述国内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进展。文献计量方法将通过对论文发表时间、期刊来源分布以及关键词的分析,着力说明该领域研究特征。内容分析方法则通过梳理政策工具本土化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应用领域,进一步研判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

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享

收稿日期:2017-09-05

作者简介:陈振明(1959—),男,广东潮州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平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张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创新研究”(16ZZD042)和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之“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创中心”与“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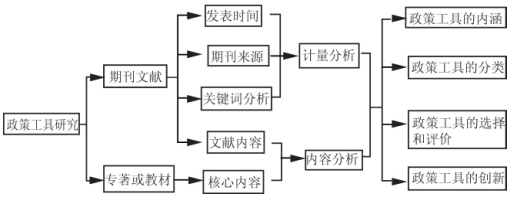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路线

有特别的地位，原稿只有经过一些审稿人的匿名评审后才得以发表（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社论和特邀稿），而这些审稿人往往是相关学科或分支的代表性作家。[4](P75) 因此，本文选取CSSCI来源期刊作为期刊研究范围，分别以“政策工具”、“政府工具”和“治理工具”为“篇名”，于2017年1月17日进行搜索，不限制发文时间范围，共得到430篇论文，除去重复性的文章，得到有效样本428篇。此外，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该领域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教材，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已经成了一个出版热点。因此，本文还将国内包含有政策（或政府）工具的公共政策学专著和教材作为分析样本，共搜集到有效样本14个，其中专著4本，教材10本。

（一）文献的时间分布

中国知网中CSSCI来源期刊最早关于政策工具的论文是在1998年发表的，有3篇论文。自此，该研究主题下的论文数量持续上升，从整体研究趋势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如图2所示。从数量分布来看，有三个大的增长点，第一个大的波动是以2008年为分界线，研究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陈振明和薛澜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一文，该文指出政策工具研究应作为未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四个重点领域之一，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 而该文在政策工具研究的论文中也是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一篇，被引次数高达270次。第二个大的增长趋势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恰好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发展30周年，《中国行政管理》发表了《寻求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该文指出要紧密跟踪国外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结合国内实践，加强对政策工具（特性、分类、选择、评价、应用和组合）的拓展研究。[5] 第三个大的增长点出现在2014年，这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密切关系。该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改进治理方式，实现治理工具的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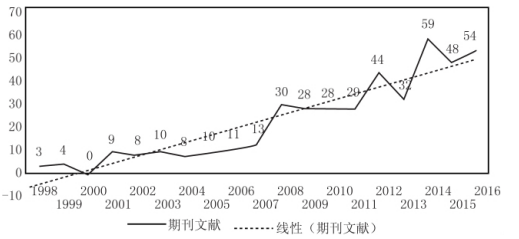

图2　政策工具研究的期刊文献数量分布（1998—2016年）

（二）期刊的来源分布

本研究搜集到的有效样本428篇，分布在204本不同的期刊杂志上，平均每个期刊发文2篇。发表政策工具研究领域文章最多的期刊是《中国行政管理》17篇，其次是《国际金融研究》12篇，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金融》10篇，而有56.8%的期刊只发表了一篇该主题的论文（详见表1）。尽管根据布拉德福定律，研究成果在期刊上的分布是离散的、不均衡的[6]，但是政策工具研究的离散性过高，大量文章分散在不同的期刊上，而在少量期刊上的集中度又过低，很难形成引领该领域研究发展的集中优势。

表1　文献的期刊来源分布

期刊发文数量范围	论文篇数		期刊分布	
	数量（篇）	频率（%）	数量（本）	频率（%）
一区10—17篇	39	9.1	3	1.5
二区5—9篇	84	19.6	13	6.4
三区2—4篇	189	44.2	72	35.3
四区1篇	116	27.1	116	56.8
合计	428	100	204	100

（三）关键词共词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分析，共得到1208个不同的关键词，其中政策工具出现

165 次，货币政策工具出现 87 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核心词；其次是公共政策 14 次，内容分析 12 次，环境政策工具和中央银行 11 次；剩下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不足 10 次，而又有 84.9% 的关键词只出现了一次。通过 Ucinet6.0 软件对关键词共词进行分析，再通过 Netdraw 可视化技术，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当前政策工具研究的次领域分布情况：从研究主题来看，涉及政策执行、政策网络、政府治理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多采用的是政策的内容文本分析；从行业领域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财经、环保、教育等领域。这与期刊来源的类别基本吻合。在 204 本不同的来源期刊中，经济类期刊有 72 本（占 35.3%），社科综合类期刊有 66 本（占 32.4%），教育类期刊 21 本（占 10.3%），环境、科技类期刊 14 本（占 6.9%）。

二、相关文献的内容评析

西方政策工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64 年荷兰经济学家科臣（E. S. Kirschen）对政策工具的分类研究。[7](P171) 为不断满足实践的需求和挑战，西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在工具识别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对工具特性及其适用情景、工具选择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8] 国内学界在评介、引进和消化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结合国内实践经验，在政策工具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已初见成效，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政策工具研究初步确立。[5] 通过对当前国内期刊文献、专著和教材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工具分类、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对工具的评价和创新等方面。

（一）政策工具的内涵界定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又称“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或“治理工具”（Tools of Governance），这三个概念的差别主要在于体现了不同学科角度的倾向，而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毛寿龙和张成福倾向于使用“治理工具”，王满船用的则是“政策手段”，而以陈振明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采用“政策工具”或“政府工具”。正如彼得斯和冯尼斯潘所言：“初看起来，‘政策工具’的概念似乎很简单，然而，事实上，对工具概念的描述还是十分困难的。”[9](P13) 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体现了国内学者对其不同的认识。毛寿龙认为，所谓的政府治理工具就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手段[10]；张成福强调了政策工具的机制作用，认为政策工具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路径和机制[11](P61)；陈庆云则指出，政策工具不仅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更是连接目标和结果的桥梁[12](P81)；张璋从新制度主义分析途径进行研究，将政策工具视作是物品或服务、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系统、制约提供系统行为的规制（即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一种固定的结构[13](PP74-81)；朱春奎从政策目标和行动过程进行思考，认为政策工具就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之间的连结机制[14](P128)；陈振明通过梳理不同学者的观点，将政策工具的内涵归纳为三个方面：从主体来看，应明确运用政策工具的主体是政府；从目标来看，政策工具是政府以实现政策目标为导向而采取的；从内容来看，政策工具是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技术、方法和机制。因此，可以将政策工具定义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实现机制，即各种主体尤其是政府为了实现和满足公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和实现机制，为了满足公众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15](P55)

（二）政策工具的分类研究

20 世纪公共行政所强调的功能主义，对工具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意义。政策工具研究领域中，学术界最早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策工具的识别和分类”这个次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工具的分类都有种异常的热衷，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工具箱”。国外学者的起步相对较早，对这个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90 年代之后的研究越来越少，研究已趋于成熟。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1 世纪之后，在对国外理论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管理方式的实际运作，对工具分类的研究也已颇具规模。张成福依照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从介入程度由

强到弱，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政府部门之委托、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市场运作 10 种工具。[11](P62) 同样是以政府介入程度为依据，陶学荣对政策工具的分类则更加宏观，他将政府使用权威的程度和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介入程度一并纳入分类标准，将政策工具划分为经济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会性工具 5 大类，每一类下面分别列出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供选择。[16](PP161-169) 而何明升和白淑英则从网络化时代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视角切入，按照政府介入程度，对现有工具进行通约性检视，进而识别和归纳出 12 种通用性网络政策工具，并构建了一个“网络政策工具谱系”[17]。王满船对现有政策工具研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可以将政策手段划分为规制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教育工具（信息手段）。[18](PP126-128) 朱春奎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分类成果，区分出了 13 类工具类型，71 种工具，打造了一个非常齐备的工具箱。[14](PP134-136)

以上学者对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思路并没有摆脱加拿大学者豪利特和拉米什的政策工具三分法，均以政府介入程度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研究。以下几位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对政策工具分类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研究。陈振明认为，随着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技术在政府治理中日益加强，现代化管理技术已经成为当代行政管理发展的一般趋势，因此，根据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的三分法。[19](PP44-62) 湛中林认为，交易的属性不同，相应的治理结构即政策工具也就不同，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可以将政策工具分为“离散交易型政策工具”、“公共交易型政策工具”（或称为集中交易型政策工具、管制交易型政策工具）和“混合交易型政策工具”。[20] 赵德余尝试将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和政策治理交易关系的货币化程度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二维矩阵模型来对政策工具进行更细致的分类。[21](PP74-81)

尽管国内学者对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但是很多分类没有将非正式工具纳入研究范畴。在“新公共治理”范式下，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更广泛的非正式准则下，开展网络化的协作关系治理模式，这对政策工具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挑战。[22]

（三）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评价

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领域，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评价是一项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和组合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需要明确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标识出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二是如何进行工具选择的问题。[2] 彼得斯和冯尼斯潘归纳了当前研究政策工具选择的 5 种研究途径，即传统工具途径、背景分析途径、制度分析途径、公共选择途径和政策网络途径。[9](PP35-41) 根据不同的研究途径，国内学者对影响政策工具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途径

研究途径	强调关系	关注焦点	国内代表学者
传统工具途径	目标—工具	政策工具本身	—
背景分析途径	背景—工具	工具的背景环境	王满船、毛寿龙
制度分析途径	制度—工具	制度结构与风俗习惯	张璋
公共选择途径	偏好—工具	政治家和政府官僚动机	张成福
政策网络途径	网络—工具	网络特性、规范和网络成员	陈振明

任何工具的选择都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考虑其运用的特定环境和特定制度。国内学者也日趋关注政策环境对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途径来分析影响工具选择因素之间的张力。王满船从背景分析的途径，研究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并强调背景环境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重要意义。[18](PP149-150) 张璋从制度分析的途径，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工具绩效的向量、行动者的向量、治理问题

的向量和制度的向量(即治理网络的向量)”四个向量共同作用的影响。[13](PP74-81) 政府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时,如何选择有效的治理工具去解决问题,张成福倾向于从公共选择途径进行分析,强调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多元利害关系人和外部因素的影响。[23] 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陈振明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遵循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指出政策工具选择应当关注政策目标、政策资源、目标群体、政策执行机构和政策工具应用的背景。[15](PP64-66)

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确定后,如何确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选择模型便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各自领域构建了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豪利特和拉米什的综合选择模型。该模型设置了“国家能力”和“政策子系统复杂性”两个维度,将使用最多的四种工具联系起来,构建成一个新的综合模型。[24](P281)

尽管“国家能力”和“政策子系统复杂性”反映了工具所依附的特定背景和制度之间相互联系的总体态势,但是该模型仅阐述了一个宏观的大体预期,缺乏对工具类别的具体倾向以及特定决策环境的深入探讨。[21](P282) 事实上,政府如何选取政策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涉及多个面向,需要对政策目标和政策环境进行仔细考量,并对工具进行理性选择和策略组合。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首要问题是政策工具能否符合网络般的政策背景。[9](P73) 丁煌和杨代福认为,在进行政策工具选择时,须考虑理性与网络两个属性,既要考虑政策工具本身的效果,也要考虑政策工具运作的环境,其将“政策网络”视为核心环境,构建了一个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25],如图 3 所示。

周英男和刘环环也将政策环境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政策工具选择模型。该模型包含目标层、指标层、方案层三部分,并设定“强制性、直接性、自治性、可见性”为政策工具的选择维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最终构建出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26],如图 4 所示。

王辉假设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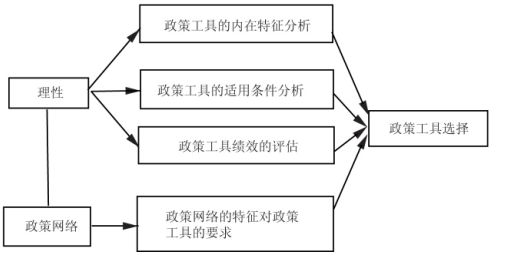

图 3　基于政策网络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

资料来源:丁煌,杨代福.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J]. 行政论坛,2009,(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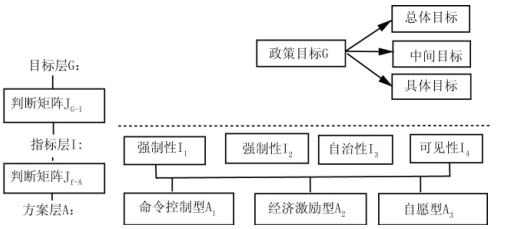

图 4　基于 AHP 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

资料来源:周英男,刘环环. 基于 AHP 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19。

环境共同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并构建了一个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其将四川 Z 乡农村义务教育和不收费公路作为纯公共物品的代表、将农村自来水供应和农村民办养老作为俱乐部物品、将农田灌溉系统作为公池资源的代表来验证该模型[27],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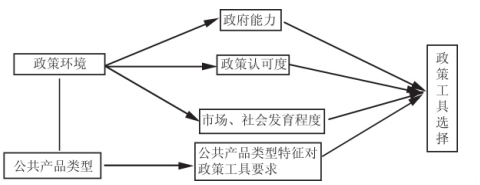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

资料来源:王辉.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 Z 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2014,(6):16。

在政策工具选择模型构建中,除了要考虑政策目标这一要素外,湛中林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还取决于政策工具运用的交易成本。因此,他从产品的公共性和私人交易成本两个维度,设计了四种不同的组合[20],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交易成本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

		私人交易成本	
		低	高
目标产品的公共性	低	离散交易型工具(市场)	混合交易型工具(偏政府)
	高	混合交易型工具(偏市场)	公共交易型工具(政府)

资料来源: 湛中林. 交易成本视角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创新[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102。

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离不开评价标准的建构,对于政策工具的评价应当贯穿于工具选择与使用的全过程。国内众多学者对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政策工具绩效的评价研究还有待加强。陈振明是国内较早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鉴于众多制约政策工具选择及评价优劣因素的存在,他建议"通过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来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而对税收政策的效果则可以通过是否满足公平性、效率性、中性等原则来判断"[19](PP81-84)。在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评价研究的基础上,陈振明进一步论证了政策工具的评价标准,建议主张将"有效性、效率和公平性"三个维度作为公共政策领域评估工具的评价标准。[15](P70)

(四) 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

政策工具的发展应当结合政府部门的实践需求,不仅要具有动态性,还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尽管我国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政策工具,但是,杨代福和丁煌认为,当前国内政府部门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其以我国政府近年来创新的十种政策工具(政府 ISO9000、购房入户、燃油税、排污交易制度、治安承包责任制、BOT、教育券制度、行政服务中心、听证会与人大常委会市民旁听制度)为例,在初步归纳其创新实践状况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政策工具创新的理论模型,如图 6 所示。[28] 湛中林认为,应以节省交易成本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推动政策工具从统治型、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依照市场决定论,应当更多运用"产权制度"对资源确权赋能,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工具实现资源的动态配置,更多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提供公共服务;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要进一步减少政府规制工具的运用,强化弥补市场失灵工具的运用,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打造"有为政府",要积极创新运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政策工具。[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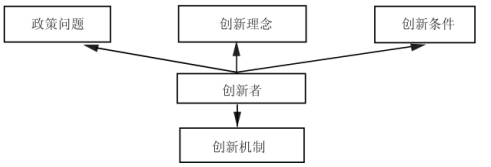

图 6　政策工具创新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 杨代福,丁煌. 中国政策工具创新的实践、理论与促进对策——基于十个案例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1,(2):69。

三、结语与讨论

国内政策工具的研究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道路,涌现了众多的文献和成果,该领域也正在成长为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学中一个有前景和生命力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内学者并没有拘泥于照搬国外已有研究成果,而是结合我国当前政府治理改革的实际,对政策工具的分类标准进行了再界定,修正了国外学者对政策工具影响因素的选择模型,建构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本土化模型,提出了在新公共治理范式下推进我国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政策工具创新模式。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覆盖了政策工具研究领域中的内涵界定,工具分类、选择、评价及创新在内的各领域,既有基础性的概念界定,也有深层次的理论建构。

尽管我国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政策工具的运用和评价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的路径[29],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有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可以说还没有真正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套用,对该领域概念、理论和方法批判的分析、消化和吸收还不够深入,缺乏对政策工具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深入拓展。[30] 目前,中国政策工具的研究正面临着新发展与新突破的良好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政策工具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实现机制，是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创新政府服务方式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和新机遇对政策工具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本文认为中国政策工具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策工具的优化和组合须以问题为中心，切实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应当改变过去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加强学研界围绕以问题为导向的解题能力，通过跨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融合，共同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解决办法。从上述对关键词的分析看[31]，当前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环境保护和教育领域有所涉猎，但是对众多涉及社会民生发展领域问题的关注度还不够，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的需求。政策工具作为政府解决公共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运用的实际方法，这就要求政策工具的研究应当遵循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将研究领域内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转变为能够直接运用到改进政策执行手段、创新政府治理方式，从而切实提高政策实施质量和公共管理服务水平。

其次，政策工具的研究须以实践为导向，着力于提高研究的应用性和适用性。政策科学强调行动取向，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统一性，因此，政策工具的研究必须以我国具体实践为出发点，以现实问题解决为立足点，构建本土化特色的研究途径。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政策工具作为政策过程中诸多变量中的一个因子，其适用性还受具体环境因素的影响，应当特别关注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对工具使用的影响。从上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来看，当前对政策工具的研究多集中于模型的理论构建，缺乏对模型进行有效的实证检验。如何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理论模型，从而完善理论建构，为实践需求提供理论指导，是未来学术界应当重点关注的领域。

最后，政策工具的研究应坚持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同时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要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将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与全球化治理相结合，加强理性方法和超理性或非理性方法在政策研究和分析中的应用。[32] 事实分析和价值分析同等重要，不可偏颇，对政策工具的研究不仅需要理性的技术判断，更需要对价值伦理的推导。当前国内现有研究多为学科内的描述性研究，缺乏跨学科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同时对工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关注也不够，这将是国内政策工具研究亟待加强的部分。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薛澜.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2] 陈振明. 政策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论作为公共管理学新分支的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主题和意义 [J]. 中国行政管理，2004，(6).

[3] 顾建光，吴明华. 公共政策工具论视角述论 [J]. 科学学研究，2007，(2).

[4] [美] 杰伊·D. 怀特，盖·B. 亚当斯. 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M]. 刘亚平，高洁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陈振明. 寻求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J]. 中国行政管理，2012，(4).

[6] Bradford，S. 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 Engineering [J]. 1934，(3550).

[7] 陈振明. 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 陈振明，和经纬. 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进展 [J]. 东南学术，2006，(6).

[9] [美] B. 盖伊·彼得斯，弗兰克·K. M. 冯尼斯潘. 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 [M]. 顾建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 毛寿龙，李文钊. 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研究 [A]. 第一届中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 [C]. 2008.

[11] 张成福，党秀云. 公共管理学（修订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张璋. 理性与制度——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 [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

[14] 朱春奎. 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5] 陈振明. 政策科学教程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
[16] 陶学荣. 公共政策学(第三版) [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17] 何明升,白淑英. 网络治理: 政策工具与推进逻辑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8] 王满船. 公共政策制定: 择优过程与机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19] 陈振明. 政策工具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 湛中林. 交易成本视角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创新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
[21] 赵德余. 公共政策: 共同体、工具与过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2] [美] 莱斯特·M. 萨拉蒙,李婧,孙迎春. 新政府治理与公共行为的工具: 对中国的启示 [J]. 中国行政管理,2009,(11).
[23] 张成福. 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 [J]. 公共行政,2003,(4).
[24] [加] 迈克尔·豪利特,M. 拉米什. 公共政策研究: 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 [M]. 庞诗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5] 丁煌,杨代福.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 [J]. 行政论坛,2009,(3).
[26] 周英男,刘环环. 基于 AHP 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研究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
[27] 王辉.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 Z 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2014,(6).
[28] 杨代福,丁煌. 中国政策工具创新的实践、理论与促进对策——基于十个案例的分析 [J]. 社会主义研究,2011,(2).
[29] 张书涛. 政府绩效评估的政策偏差与矫治: 基于府际协同治理的视角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0] 陈振明.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31] 陈振明. 政策科学与智库建设 [J]. 中国行政管理,2014,(5).
[32] 陈振明. 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 [J]. 中国社会科学,1997,(4).

责任编辑　思　源

New Development in Studies on Domestic Policy Tools: 1998—2016

CHEN Zhen-ming & ZHANG Mi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policy tools,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rea of study,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and is becoming a promising and viable research direction in policy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ith abundant results. Using CSSCI-collected papers as well as published monographs and textbooks as research samples, we adopt the literature measurement and text-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process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research on domestic policy tool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is field in China has both the basic concept definition in terms of tool classification,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deep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owever, it has not completely got rid of the imitation of the West and its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guide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to more depth, we should take the solution of policy issues as guideline, and adop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uild a localized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 policy tools; policy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